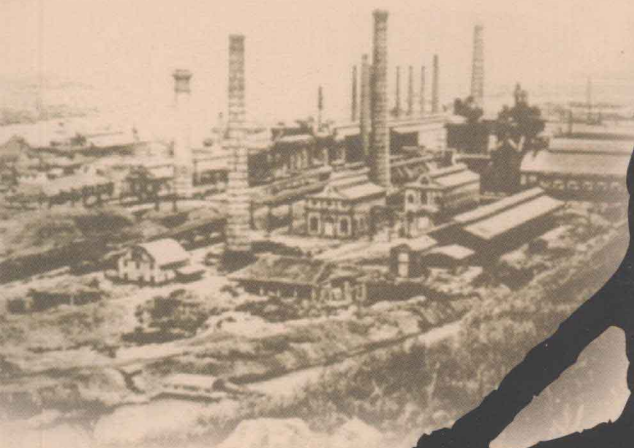




大河

Changhe Luori
Zhang Zhidong Yu WuHan

张之洞与武汉

陈秋芳 著



大河

张之洞与武汉

陈秋芳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河落日:张之洞与武汉/陈秋芳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9

ISBN 978 - 7 - 216 - 06920 - 5

I. 长…

II. 陈…

III. ①张之洞(1837~1909)—人物研究

②历史事件—史料—武汉市—近代

IV. ①K827 = 52②K296.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9406 号

长河落日:张之洞与武汉

陈秋芳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道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印张:10.75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插页:2

版次: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52 千字

定价:25.00 元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6920 - 5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序

熊召政

早在今年春上，陈秋芳就把一摞打印的书稿送给我，请我闲暇时读一读并为之写一篇序言。我当时应允了下来，却不知杂事如此之多，拖到仲夏二伏天，秋芳电话告之出版社已经将书稿付梓，就等着这篇序言了。这才促使我暂摒俗务，摊开书稿通读一遍。殊不料这一读，竟产生了评介的冲动。

这部书稿以晚清名臣张之洞督鄂时发生的历史事件为经，以武汉百年来城市发展的沧桑巨变为纬，勾勒出张之洞变新求强的改革史与武汉这座城市的变迁史，以及武汉乃至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坎坷历程。意旨宏远，内容翔实。融史迹于故事之中，寓思考于证史之内。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者下过的苦功，褒奖贬抑，都有见地。特别是作者完全从历史的眼光出发，采取摆脱学术论文般拘谨的思想自由度进行写作，从而使本书的陈述和描述获得了不拘一格取便发挥的特色，使读者能获得通俗易懂、趣味盎然的阅读效果。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晚清朝廷的名臣审时度势，挽救大清危局且作出事功的汉人里面，只有不多的几个人，像曾国藩、左宗棠、刘坤一、翁同龢、李鸿章等等。张之洞侧身其中，亦称翘楚。无可讳言，作为晚清朝廷的股肱大臣，张之洞的政绩与事功，最让人称道并青史留名的，当是在湖广总督的任上创造的。

一个人在何处、何时做下何等辉煌的事业，冥冥之中仿佛



有天意指引。记得我那年去苏州，看到市中心繁华之处，立有伍子胥的巨大雕像，且老城许多街巷的名称，也与伍子胥有关。苏州百姓说起伍子胥，莫不都表示崇敬之情。可是在伍子胥的家乡湖北，恨他的人却比爱他的人多得多。究其因，就因他是楚国人，最后却帮助吴国成为南方的霸主，并一度灭过楚国。因此，他成为吴国的英雄却被楚人视为仇敌。这段公案过去了两千余年，争论一直不息。

张之洞与伍子胥不可类比，但有一点两人却是相同的。他们都远离家乡在异地建功立业，且都让一座城市获得新生。伍子胥之与苏州，张之洞之与武汉，在历史上，都是美谈。

在漫长的历史中，武汉三镇互不统属。江南武昌乃省城，汉阳有汉阳府，汉口一直是渔港和滩涂之地，三镇合为武汉，历史尚未超过二百年。产生大武汉的契机，应该是汉口开埠。

汉口开埠的始作俑者是英国人，时在 1861 年 3 月。兹后，法、俄、美、德、日等西方列强 17 个国家纷纷抢滩汉口设立租界。开埠的前 30 年，汉口主要是外国人的通商口岸，华中乃至西南的大量土特产通过这里转输国外，众多洋货也通过这里抢占中国内陆的市场。将外国人在武汉的“独角戏”变成中外互动的“二人转”，则是在汉口开埠 28 年之后，即 1889 年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之后。

一座城市的历史即是这座城市文化。陈秋芳的这部书稿，从汉口开埠写到辛亥武昌首义。笔锋追处，既稽古钩沉武汉的沧桑往事，又以缅怀先贤的心态描摹张之洞的卓越人生，并且探讨对辛亥武昌首义乃至后世的影响。历史画卷，卷舒自如。既是为人物立传，又是为城市立传。书名《长河落日》，亦可窥见作者对已逝历史的追思。

说实话，陈秋芳能写出这部书稿，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



料。虽然先后在部队、机关和企业工作，他却一直从事新闻、理论和文学写作。此前，我读过他的一些散文、诗歌，无论故乡人事，还是生活感悟，都是质朴儒雅。没想到，他竟能将文笔转换为史笔。可见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能够摒弃各种耗费精力与时间的应酬，回到书斋静心研究史籍并发而为文。这种人生态度，是这本书质量的保证。

2011年7月27日夜灯下

（序言作者为中国当代著名诗人、作家、学者，其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目 录

屈辱汉口/1

汉口开埠后,作为上接川陕的湖北武汉,自然是列强们拼命渗透和争夺的重点,纷纷抢滩汉口,纷纷在汉口建立洋行、开办工厂、设置银行,操纵和掠夺我国财富,使中国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虽说当时武汉城市的发展呈现一定的繁荣,但是一种畸形的繁荣,民族经济发展出现了萎缩和滞后。

张之洞与武汉的缘分/12

历史给了湖北武汉发展近代化的机会。张之洞因上奏议建芦汉铁路,1889年8月,朝廷将他从两广总督调任两湖总督。张之洞督鄂18年,在武汉主新政、兴洋务、开工厂、办教育、练新军,不仅使他成为晚清儒学士大夫中的出类拔萃之辈,也成就了武汉这座大都市的根基。

汉阳铁厂雄傲亚洲/23

1890年7月,张之洞主持成立湖北铁政局。借重长江、汉水对煤、铁、矿石等的运载,将汉阳铁厂建在汉阳龟山北麓。汉阳铁厂的创办,当时不仅在武汉、就是在全国,也是为前人所未有之事业,前人所未有之难事。虽为总督大人所亲自创建,但创业伊始,仍然举步维艰。汉阳铁厂的创业艰辛、卓异成就和结局,昭示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坎坷历程。

湖北枪炮厂与“汉阳造”/34

晚清的军事变革以甲午战争失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甲午战争前主要包括推进陆军火器化,建立近代海军,创办近代军事工业等,即“师夷长技以制夷”。1894年以后,主要体现在编练新式陆军和发展陆军教育。湖北枪炮厂就是由晚清军事变革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变背景下的产物,设备先进,生产自成体系,奠定了武汉作为中国近现代武器生产发源地的地位。

布衣兴国 蓝缕开疆/40

张之洞先后在湖北武汉创办“布纱丝麻”四局,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近代纺织工业体系,奠定了武汉作为华中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的地位。特别是其通过招商形式,吸纳商股,为创办实业寻找了一种筹融资渠道,不仅为武汉的近代工业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还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进行了有效抵制。

姗姗来迟的京汉铁路/48

从1870年开始,清廷围绕是否修建铁路,洋务派和顽固派产生了激烈争议。事隔8年,张之洞向朝廷上了一道《请缓造津通铁路,改建腹省干路折》,清廷决定先办芦汉铁路。想不到东三省边境形势骤变,为了防御俄、日,朝廷下旨“先办东三省铁路”。直到1897年,芦汉铁路才开始由河北、湖北两省分段同时开工。

兴学育才 武汉创先/57

张之洞说:“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

强由于学。夫立国出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不蓄而求,岂可幸致。”张之洞作为晚清时期著名的“中兴名臣”,不同于其他洋务领袖、封疆大吏和中枢重臣,就在于他一生推行以兴教育作为治国之本,并身体力行、成绩卓著,堪称中国近代教育第一人。

民族工商金融业,在挤压中前行/66

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受“重农轻商”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响。随着国门洞开,导致了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商业竞争的激化。特别是武汉,面对洋货的倾销,国人危机感日增。从两广移督署鄂的张之洞,清醒地看到了西方殖民者从军事到经济对我国的掠夺,也充分认识到了商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他把商业的重要性放在国家主权的层次上加以论证,认为政府应把商业置于重要的位置,制定配套的扶植与保护政策。他在汉口设立商务总局,开全国风气之先。

武汉城市近代化的奠基者/74

张之洞督鄂后,西方各国相继沿长江向下游租地建租界,市区面积越来越紧张。同时也为了进一步解决汉口水患问题,他报奏朝廷修筑汉口后湖长堤,为新市区的拓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他还着手修建武昌“武泰闸”、“武丰闸”,规划马路、邮政、电灯、电报、自来水等一大批市政公共设施建设。

总督府的人才库/80

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幕府和幕僚制度,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智囊班子,在张之洞时代,被他和他的同僚们用到了极致。这些幕僚,或通晓政务,文才擅长,能草拟奏章;或精通军事谋略,能献策取胜于帐前;或善理钱财,能包揽钱粮;或

熟悉律令，能代办词讼。到了晚清，西风东渐，张之洞的智囊班子里，还多了“通夷务”的人才。

“变事”不“变制”/88

张之洞对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是极力捍卫的，他认为三纲五常、孔孟之道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可变更。他认为，清王朝已经有很多“宽民”、“爱民”的深仁厚德和良法善政，没有再设议院的必要。因此他竭力提倡维护大清国，说“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

秋声萧杀紫阳湖/100

当时的维新派人士以及民主革命人士，不少对一些朝廷的汉族大员抱有幻想。由于两湖书院的经历，唐才常算是张之洞的“门生”，唐的计划是，首先夺取汉阳兵工厂，然后拘禁张之洞、张彪等人。但同时，他又准备亲自劝说张之洞成立“东南自立国”。其实，作为朝廷大员、一方总督，张之洞早就对唐才常和“自立军”有所防范。

“新政”主角与灯下黑/112

继戊戌变法之后，清廷又有过一次变法。变法的内容和范围基本上是按照“中体西用”的原则，即在不改变清王朝的国体以及三纲为核心的传统伦理的前提下，对政治、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的体制进行改革。这一时期，先后由于刘坤一去世，袁世凯下台，作为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实际上是这次变法或者称之为新政的实际主角。

毕竟东流去/120

1907年8月，71岁的张之洞在武昌接到朝廷圣旨：以协



办大学士、湖广总督，擢任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1908年，又为粤汉铁路督办大臣。进入中枢、操握政柄、治国安邦、匡时济世，作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张之洞，这是他人生的理想，也是他人生事业的最高峰。这时候的张之洞，早已没有了那种“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雄心壮志，变得有些心灰意冷了。

武昌燎原/128

1911年10月10日傍晚，湖北省城武昌，湖北新军内的革命党人爆发起义。经过一夜激战，革命士兵攻入总督府，光复了武昌全城，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宣布国号为中华民国。武昌辛亥首义的枪声，使中国四方震动、各省响应，从而推翻了统治中国268年的腐朽的清王朝，也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

参考文献/154

左手首义园，右手抱冰堂(代后记)/156

屈辱汉口

武汉这座城市之所以被称为“大武汉”，除了它“两江携三镇”的独特城市格局和“九省通衢”的地理区位优势，造就了它作为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市场化的名镇地位，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历史背景，一个是 150 年前第二次鸦片战争汉口的被迫对外开埠；另一个是晚清后期“洋务新政”的杰出代表人物张之洞督鄂，开创了武汉的近代工业和城市格局。

时间长河，虽说无情地洗去了那些曾经的辉煌、繁华和荣耀，也洗去了那些无奈、屈辱和丑恶，但总会留下一些东西，让今天的我们在明朗的蓝天和阳光下，去寻找那些遗留的痕迹，通过这些痕迹走进昨天、重新审视某一段历史。

毕竟，历史不会让人轻易地忘记和忽略。

武汉这座城市，就是这样——

我曾多次从汉口的江汉关和江汉路，顺着沿江大道或者中山大道往东，一直走到黄浦大街，在斑驳的斜阳中，观看那一栋栋建造于一百多年以前、带有浓厚 19 世纪中期维多利亚时代特色、西班牙风格、南亚殖民风格、新古典和巴洛克风格、俄罗斯风格的古老欧式建筑。

虽说这些老建筑经过一百多年的风吹雨打，被今天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现代高楼所挤迫，已显得落寞和陈旧（有的已整旧如旧），但就像一位位历经世事沧桑的嶙峋老者，即使“寂寞无语”，但仍能让我强烈地感受到历史的影子和印记、感受到武汉这座城市当年的屈辱和疼痛。

这些历史的影子和印记在刺痛我的时候也告诉我，一百多年前，这座地处华中长江中游的商业交通重镇，因晚清王朝的腐朽无能被迫对外开埠，变为列强的通商口岸，这些繁华的地段，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晚清王朝在英、法、美、俄的炮火逼迫下，于1858年6月23日与列强四国分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为：公使进驻北京；开放牛庄、天津、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11处为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以自由驶入长江一带通商口岸；外国人可以到内地游历经商；外国传教士可以到内地自由传教等。从此，中国沿海和长江流域都成为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资本活动的场所，汉口成为列强们的俎上肉。

1861年3月，英国侵华海军司令贺布与英国参赞巴夏礼率本国官员、商人、翻译，分别乘坐兵舰、火轮4艘，在数百名士兵的护卫下，从上海溯江而上，到武汉会见了当时的晚清王朝湖广总督官文，要求按照《天津条约》，办理在汉口的开港和立行通商事宜。3月20日，巴夏礼与湖北地方当局签订了《英国汉口租地条约》，在汉口划定英租界。

当时的汉口市镇，以汉水旁边的老街为中心，也就是今天的硚口一带，店铺密布，商贾云集。而汉口从龙王庙起沿长江往下游一带，则还



汉口租界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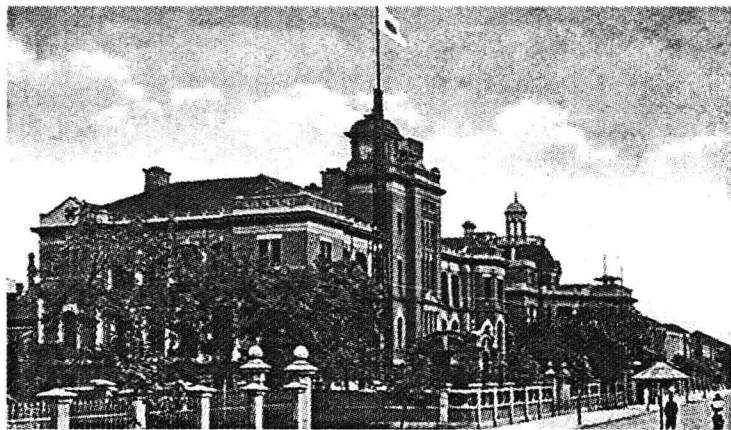
是大片荒凉的江滩,没有街区,没有像样的建筑物,但面积开阔,比老街大出好几倍。

英国人看中了这片紧邻长江、航运停泊方便的地方。英国侵略者经与湖广总督官文商定,将汉口江边花楼巷往东至甘露寺江边东角大约 460 亩的土地租与英国。不久,上海英国领事署宣布将“汉口、九江辟为商埠,设置领事”,英国首任驻汉领事金执尔很快抵达汉口,在这里设置领事馆开始办公。

在今天汉口的天津路离沿江大道不远,有一幢保留完好的、具有 19 世纪中叶维多利亚时代特色的二层砖木结构的西式楼房,就是建于 1861 年的英国驻汉领事馆官邸,也是汉口最早的西方建筑。据资料显示,这里曾经共有 3 幢建筑,既是英国领事馆的办公机构,也是总领事及副总领事的官邸。领事馆还在周围种植了大片草坪,建了阔大的花园。

1861 年上半年,汉口正式对外开埠通商。

汉口开埠后,作为上接川陕的湖北武汉,自然是列强们拼命渗透和争夺的重点,外商纷纷抢滩汉口。英、法、俄、美、德、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匈牙利、日本、瑞士、秘鲁、巴西等 17 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来汉贸易,纷纷在汉口建立洋行、开办工厂、设置银行。由于汉口



汉口租界日本领事馆



开埠后各国商船停泊日多，长江沿岸需要码头、泵船等设备，岸上需要堆栈、仓库、公司等为其服务，继英租界后，德国、俄国、法国、日本也先后与晚清王朝湖北当局签订了汉口租地条约，划定了租界。

在租界临近的长江边，列强们就在汉口长江沿岸修建码头。英国商行所修码头就有 8 个，不仅用来装卸本国或者西方别国的进出口货物，同时也用来停靠军舰（军港）。还有俄国、美国等商行也建有码头。

租界作为“国中之国”，在汉口存在了 84 年，它在给我们带进来一些西方近代文明的同时，如拓宽马路，建起了网球场、跑马场，率先通过火力发电、使用电灯等，更多的是成为了列强们侵入中国的“桥头堡”。在政治上，它不断插手湖北、武汉政局，如协助镇压人民反抗清朝封建专制压迫的斗争，镇压自立军起义。武昌起义后，又暗地保护满清官员。他们为了更多更快地敛财，组织武装贩运鸦片烟土，大量倾销内地，毒害我国人民。租界成了公开的“烟、赌、娼”地界。

在经济上，汉口租界前濒长江，后近铁路，以此作为外贸基地，大量倾销洋货，廉价收购我国内地土特产。列强控制了我国海关，垄断了航运和金融，低价买、高价卖，一本万利，大量掠夺我国人民财富。

在租界内，华人被视为“二等公民”，订立的章程，都加入了若干对华人的歧视性条款。

开埠以后，英国汇隆银行即在汉口设立代理处，由于人们一时还不能完全接受，生意惨淡，不久破产清理。1863 年夏，英国麦加利银行来到汉口开设办事处，1865 年在英租界内（今洞庭街 55 号）建立行址正式开业，成为汉口的第一家外国银行。随之而来的还有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美国花旗银行、比利时华比银行等，相继在汉口开展业务。到 1882 年，汉口的外国银行达 10 余家，其后曾一度发展到 40 家之多。

开埠后，外商利用汉口“九省通衢”的内陆辐射优势，纷纷在汉建设制茶厂、蛋品加工厂、打包厂、制革厂、卷烟厂、制冰厂、汽水厂、食品厂、榨油厂、制酒厂、灯泡厂、金属加工厂、机械修理厂。至辛亥革命前夕，外国列强在汉建立工厂达 40 多家。与此同时，西方生活日用品大量进入汉口市场，如皮鞋、五金、颜料、钟表眼镜、火柴肥皂、化妆品、假珠宝、

玩具、西服、针织袜等。一时间，汉口出现百货店数十家。

列强们之所以看中汉口并在长江边的荒地上划定租界，就是看中了武汉优越的航运区域优势和港口码头条件。

早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即有洋商船只航行于沿海。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又开了南至琼州、潮州，北至牛庄、天津，西至汉口等多处商埠。于是外轮得以直入长江、大沽口。各国闻风而至，英、法轮船公司和在华洋行，纷纷插足长江的航运业。

1861年4月，美商琼记洋行的“火鸽”号开始航行沪汉线，头3个月就赚了50万银元。

英国宝顺洋行的“总督”号尾随而来，加入沪汉航线，往返一个航次的运费收入便相当于一艘船的价格，于是又调来“富士山”号等3艘轮船。

美商于1862年在上海成立旗昌轮船公司，1864年即派出“湖广”号等5艘轮船加入沪汉线。同年，英商怡和洋行也将两艘轮船转入沪汉航线。据统计，1861年后的8个月，进出汉口港的外国轮船达401艘次，1862年增至406艘次。

至19世纪70年代，外轮侵入的势头继续扩大和深入。仅以美国的旗昌为例，旗昌公司采取降低运价等手段开展竞争，使许多洋行力所不敌，有的只好退出沪汉线，或将船产卖与旗昌，不久，旗昌一时间垄断了长江航运。1867至1872年的6年中，旗昌轮船公司获利468万余两，为其1867年资本总额125万两的3.74倍。1872年起，英商太古洋行先后投入9艘轮船行驶沪汉、汉宜线，与旗昌展开激烈竞争，最终迫使旗昌妥协，使之共同垄断沪汉航线的经营权。

1881年，规模更大的怡和轮船公司以12艘轮船加入沪汉线的竞争。

1898年，日本邮传株式会社辟沪汉、汉宜线。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在日本政府每年9万多元补助的鼓励下，也加入沪汉、汉宜线的航行。1903年，日本政府资助湖南汽船会社开辟汉口至湘潭、汉口至常德的航线。1907年，日本将大孤等四家公司合并重组为日清汽船会社，以17艘轮船在汉口通航。

据《汉口》一书载：至 1908 年，英、日、德、法、美共有 9 个轮船公司、29 艘轮船航行于汉口，垄断了沪汉、汉宜、汉湘线的航运。1904 年，外轮在长江的吨位相当于中国商船的 3 倍。仅怡和、太古、日清三家轮船公司从开办至抗日战争前夕，获利达 3000 万两白银。

此外，外国轮船公司还建有栈房、码头。光绪年间，太古、怡和、大坂各有 6 间栈房、三家堆栈，总面积达 2 万平方米以上。大孤公司还有可载货 1351 吨的“元安”号囤船。由此，中国长江内河航运权逐渐沦于洋商之手。

在外轮横行长江时，中国人自己办轮船航运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晚清王朝和湖北地方当局面对外国势力的挑战与竞争，只求自保，很少有所作为。后来在李鸿章主持下，清廷委派道员身份的漕运海运委员朱其昂、朱其诏兄弟向英国购进“伊顿”轮船一艘，于 1873 年 1 月 14 日正式成立轮船招商局，次年于汉口设立分局。但由于中国当时与西方工业技术能力的差异，特别是晚清王朝商业法律环境的缺乏，轮船招商局的发展仅仅依赖于朝廷大员的保护，极大地限制了本国民间资本的投资热情。直到盛宣怀完全进入轮船招商局，实行“商本商办”的转变后，才逐渐增加竞争能力，并于 1874 年与太古等公司联手与实力最强的旗昌公司进行竞争，迫使其出现亏损，处境艰难，100 两面值的旗昌股票到 1876 年仅值 56 两。加上美国内战后经济出现繁荣，旗昌产生投资国内的欲望，于是盛宣怀主持轮船招商局于 1877 年将旗昌公司船产购买。

但是，洋商是不希望中国的轮船招商局做大的，曾与招商局合作的太古、怡和轮船公司极力跌价倾轧，争揽客货，时刻倾挤和打击。到辛亥革命前夕，招商局的轮船总吨位亦不过 7000 多吨，打破不了外轮垄断长江航运的局面。可以说，以汉口为代表的内江通商，外国轮船往来长江流域各口岸，不仅贩运洋货，而且揽载土货，给我国近代航运业以致命打击。

除了长江航运，汉口的茶叶贸易也被俄国所垄断。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汉口成为新辟的 10 个通商口岸之一。俄国人以其多年与我国往来贸易的经验，特别看重汉口的茶市。他们借 1862 年与清政府签订的